

1935:

图片 20 世纪中国编年丛书

危机再现

◎ 主编 李继锋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35:

危机再现

● 主编 李继锋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5: 危机再现/李继锋主编.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4

(图片 20 世纪中国编年丛书)

ISBN 7 - 80603 - 733 - 0

I. 1... II. 李... III. 中国 - 现代史 - 1935 - 史料
IV. K263.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102752 号

责任编辑 汪稼明 曹凌志

装帧设计 王 芳 蔡立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2060055 - 5420

市场部(0531)2053182(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85 × 230 毫米

14.5 印张 145 幅图 13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7000

定 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目 录

[这一年]

李继锋 中国:谷底的挣扎/1

[名人聚焦]

陈红民 来去两徘徊:胡汉民最后的抉择/7

刘 洋 马蹄,踏碎了鲜花,鲜花仍抱着马蹄狂吻
——解读瞿秋白《多余的话》/15

陈长刚 阮玲玉:明星的悲运/22

吴 畏 杜月笙其人/30

徐永斌 廖仲恺灵柩归葬钟山/36

[中日邦交]

张福运 东京与南京:不自然的亲善/38

徐少红 杜重远与《新生》事件/49

张福运 《何梅协定》——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54

[百家]

陈其昌 “双萧星座”的一抹辉煌/61

枫 林 中国人与象/69

张 昊 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71

张 涛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74

张 涛	儿童年的义务教育/81
[经济动态]	
徐亚玲	中国银行改组的背后/87
枫 林	标准钟/92
胡云华	同蒲铁路的开通/93
徐亚玲	天津裕元纱厂倒闭/98
[政局动向]	
贾国雄	广西:自行其是的模范省/100
韩文宁	蒋介石从幕后到前台/109
《大公报》大选前夕/114	
李继锋	学者从政的蒋廷黻/116
张爱妹	活跃的中苏文化协会/122
徐少红	张苇村:韩蒋斗法的祭品/125
[演艺圈]	
刘根勤	梅兰芳、胡蝶的苏联之旅/129
《大公报》梅剧团在俄京首次试演/137	
杨林生	电影业的危机/138
[风云长征路]	
韩文宁	回首长征路/144
刘根勤	尾追红军的薛岳/148
[地域风情]	
方 殷	澳门风景线/153
亦 英	羊城琐话/158
《大公报》绥远的司法/163	
[币制改革]	
徐亚玲	法币的面世/165
老 燕	几句摩登话/170

胡云华 李滋罗斯来华/171

[众生相]

铁 猷 苏州的女人/175

农 英 广西农村中的劳动妇女/177

菊 民 西康的藏女/180

马景云 广东顺德女子之生活习俗/183

《大公报》平市见雪后 贫民死亡多/186

[难忘一瞬]

张鹏斗 汪精卫遇刺纪实/187

《大公报》新闻记者在南京/193

[华北的恐慌]

杨林生 曹大臣 华北危机三主角/195

贾国雄 续范亭剖腹明志/209

[秘闻曝光]

张福运 国共的秘密接触/211

[故人图传]

鲁涤平/216

陈宝琛/217

孙传芳/218

唐有壬/219

黄 侃/220

戈公振/221

方志敏/222

[本年要录]/224

[补 白]

上海祥丰铁管厂广告 上海市广播无线电台播音室之一角

大中华橡胶厂广告 广州耆英大会 十子图 民生公司的广告

国民党中央关于言论自由的尺度

【这一年】

中国：谷底的挣扎

◎ 李继锋

30年代是喧嚣的，世界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人们难以忘怀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大家备受失业、饥饿和绝望的煎熬。乘乱而起的法西斯主义横行欧洲，好战的狂吼让人们胆战心惊，不祥的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地球，人类面临思想、自由和生存权利被完全剥夺的巨大威胁。只有苏联好像是世外桃源，经济建设在飞速发展，但那里的政治清洗和思想迫害也同样严酷，不过，它的真相是半个世纪以后才广为人知的。

在1935年的中国，所有世界流行的一切，中国也同样流行，从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日本侵略到共产主义运动，还多了个长久不息的内战。

1935年的元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到了岭南，去了广东和广西，他和其他许多旅游者一样，对于这两个省的印象截然不同。外观上，就像《大公报》的记者胡政之在《粤桂写影》中评价的：“广东富而广西贫，广东大而广西小。”至于内里边，胡适在《南游杂忆》里不客气地将广西与广州作了比较：“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祀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风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但为了对抗南京的蒋介石，两广的当局一直团结得像兄弟一样。当红军过镜时，他们恐惧的倒不是夺路而行的红军，而是尾随而来的南京军队。

从中央苏区撤退两个月后，中央红军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湘江一战，亲历者至今回忆起红军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悲壮一幕，仍然是心有余痛。1935年的1月，在贵州的遵义，红军的将领们无法再忍受这样重大的伤亡，

1935 年大事漫画(一)

- 1、学生国货年开幕。
- 2、华北通邮协定在津签字
- 4、伪军进犯涪源县境。
- 5、中央对察东事件认为系地方问题责成平军分会办理。
- 6、沪绅商举代表谒孔财长请设法救济市面。
- 7、汇丰银行拍卖申新七厂
- 8、蒋委员长严禁川省军人干政。
- 9、沪市府举行识字运动
- 10、美远东经济考察团抵京谒陵。
- 11、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抵京代表苏联政府声明对华无领土野心。
- 12、中委会决议先烈廖仲恺迁葬办法
- 13、宋子文在沪召集记者谈三行救济工商事宜



拥护毛泽东复出。毛泽东的复出,后来被公认为红军、共产党乃至中国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但在当时,奇迹并没有出现,为了摆脱追兵,衣着单薄、营养不良的红军队伍不得不向越来越荒凉的西南、西北方向寻找生路。在那一带,他们的敌人与其说是国民党的追兵,不如说是大自然的严酷考验,饥饿、寒冷、雪山、草地等各种因素都在威胁着这支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

蒋介石在享受着胜利者的乐趣,他不仅将红军逐出江南各省,而且让他的追兵开进了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这些省份从袁世凯失败以来,就从来没有完全臣服于中央政府。这里的将军们在红军过境时暴露了自己的虚弱和落伍,他们看到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开进了自己多年的领地,既羡慕,又嫉妒,



1935 年大事漫画(二)

- 14、日警武力查封柳江煤矿产业。
- 15、胡汉民由港赴欧。
- 16、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邦交令》。
- 17、日本反对欧美各国派经济专家来华援助中国复兴经济。
- 18、日军飞机十四架过平津监视于学忠军队移动。
- 19、国民政府令免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职。
- 20、海圻海琛离港北上中途折回。
- 21、丰台乱匪暴动进袭平市被击退。
- 22、孔德成等孔教圣贤后裔就四圣奉祀官。
- 23、黄河长江猛涨堤防溃决浮尸满江中央拨款百万救济。
- 24、全国儿童年开幕。
- 25、汪精卫辞职中常会挽留。
- 26、台米私运入汕被扣。
- 27、津市教局审编小学课本凡有碍邦交者皆被删去。
- 28、全国运动会开幕。
- 29、财政部令白银收归国有。
- 30、国民党六中全会五中全会开幕。
- 31、汪精卫被刺受重伤。(黄士英作,原载《申报月刊》)

更害怕,弱小的贵州首先被南京政府控制,云南的龙云将军盛情接待蒋介石,四川的军阀们在门户洞开后,也不敢怠慢来自长江下游的下江人。

这年初,厄运连连的中国突然受到列强的恭维,英、美、日在对华投资上

惟恐落后,争得面红耳赤。美国派来了经济考察团,日本的工商人士来得更频繁。中国俨然像个泱泱大国、远东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了。

1935年,整整一年,蒋介石的政府对日本曲意承欢。日本外相广田刚提出亲善外交,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附和,双方军政高官频繁互访,民间的经济代表团也你来我往,中日关系出人意外地迎来了小阳春。也许,这一年中日关系由公使升格为大使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5月17日,日本首先决定将两国关系从公使级提升到大使一级,英、美、德等相继效尤。可是国人刚刚破涕为笑,华北危机来了,白银危机发生了,大家立刻啼笑皆非,预感大祸临头了。

1935年,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但日本却毫不留情地断了南京政府的后路。政府为了满足日本,不惜粗暴压制本国民众的反日舆论和情绪。当“闲话皇帝”事件发生时,《新生》杂志主笔杜重远被捕入狱,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敦睦邦交令》的颁布更是异乎寻常,政府简就是在声色俱厉地警告国人,日本人可以在中国胡作非为,中国人只剩下保持缄默的自由。

1935年,也是整整一年,日本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折磨,有小题大做的精神折磨,有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还有直接肢解华北的致命性行动。日本终于真的在华北动手,南京胆怯了,从京津冀撤走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留下无依无靠的宋哲元的西北军去和日本人周旋——好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日本人夺取华北的步伐。

迹近疯狂的日本用行动证明:它要东北,它还要华北,它甚至要奴役全中国。

这一年,使得那些对日本“悬崖勒马”尚存在一丝希望的中国人,感到了幻灭,结束南方之旅回到北京大学的胡适便是其中一人。1935年底到1936年初,胡适与日本政治评论家室伏高信之间有过许多回合的通信辩论,两人对当时危机四伏的中日关系同感惶恐不安,眼看着一场战争劫难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理智胜于情感的两个知识人在拼命找寻灾难的源头。胡适发表了《敬告日本国民》一文,警告日本人:他们的行动不仅毁灭中国,也会毁灭日本。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国交向来密切。中国在占了数千年优势后,甲午战争带来了东亚新格局,日本逐渐成为东亚的主宰,中国却变得羸弱不堪,日

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着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共和国之父，他的政治生涯与日本渊源颇深——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1925年初，生命之烛行将熄灭的他，曾经逗留日本，并且对日本朝野发表忠告，警告日本要作亚洲的干城，而不是欧美的鹰犬。

就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中国最有权势的军人政治家——也曾想与日本化敌为友，甚至不惜以整个东北为代价。1934年底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可为明证。这篇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署名是徐道邻。它的精神完全是蒋介石授意的，从题目来看就可以想见蒋的心思，他不愿意与日本真正为敌。说他是亲日派也好，说他是知日派也好，其实无关紧要，他自信比别人更了解日本，也一直很敬畏日本，这应该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军队里服役的经历。和蒋介石一样，很多的所谓亲日派都是留学过日本的，他们许多人都对日本抱着幻想。因为他们不仅知道日本军队的凶狠、训练有素，也了解日本特殊的风俗、精神和文化，许多日本人帮助过同盟会与国民党，有的日本人是他们老师，有的是他们的同学，有的还是经济上的赞助者，也有的甚至相互成了朋友。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人，往往只看到日本人凶狠、贪婪、心胸狭窄和狂妄的一面，而到过日本的中国人还看到了日本文化的优秀一面，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有它的文化底蕴，并不只是侥幸所致。但他们对日本了解得越多，有时反而越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他们对于日本“改弦易辙”、“悬崖勒马”抱有很大的幻想，总以为凭自己在日本的关系和私交可以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速率与路向，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胡适在当时的中国绝算不上是激烈的反日分子，他甚至根本不主张与日本进行没有把握的战争，这从他1933年支持政府签定《塘沽协定》，后来又在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就能够看出来。所以，他完全是凭理智来考虑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虽然那个时候的日本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这一点，胡适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的文章是写给那些为数不多的理性尚存的日本人看的。如果说，胡适是中国人之中温和与理智派的代表，那室伏高信就算是日本人稀有的理智尚存的政论家，因为他意识到日本疯狂的对华侵略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但即使这样的人，居然也责怪中国人只知道向英美靠拢，而不肯与同文同种的日本亲近。

华北的命运考验着中国人的忍耐极限

共产党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大声呼吁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声明发表在8月间，那个时候，国内的共产党军队正在艰难跋涉在长征途中，它的领导人和将军们不仅对世界局势一无所知，就是国内局势也所知甚少。等到达陕西北部，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他们便准备很快地融进反抗日本的大潮流中去。这支历经数不清磨难的队伍，意志坚强得举世无双，但在数量上、装备上仍然是弱小的。他们需要休养生息，新的政策很快制订出来，最主要的就是强调将民族的危亡放在首位，使内战的对手逐渐失去内战的热情和意志。南方苏维埃时代的孤芳自赏、到处树敌的政策在党内受到了批评。

国民党仍然在和与战之间徘徊，但华北事变动摇了对日妥协政策的基础。自1932年以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汪精卫一直在前台，成为举国公认的政府亲日派首领。1935年6月下旬，监察院对黄郛、殷汝耕等六人提出媚日卖国弹劾案，汪精卫本人也受到舆论的日益严厉的批评。这是对汪精卫推行妥协政策的严重警告。蒋介石此时还需要汪精卫为亲日妥协政策分谤，于是请汪精卫复职，汪精卫也就半推半就重新视事。

但这年底，围绕冀察政务委员会——一个日本人要求成立的、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政权——的成立，中国已经到了不是爆发就是死亡的临界点。11月3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呼吁：“我们希望自此以后，政府要有一个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政府各方面负责的人，在这一个月里，要决定和与战的问题。要和就不要怕骂，就要忍痛；要战就不要怕死，准备牺牲。”

12月9日，一个凛冽的冬日。华北的数万学生走上了街头，这批血气方刚的年青人率先突破了政府压制反日舆论的大格局，在全国引发广泛的共鸣。

1935年，渐渐失去了华北主权的中国，身不由己地跌入谷底。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基被日本人彻底撼动了，向日本一味妥协、忍让、讨好的政策也已经快走到尽头。在“五全”大会上，蒋介石终于承诺，到了他心目中的最后关头，政府准备全面抵抗。无论有什么高尚的借口，内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指责。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彻底的绝望将逼得中国人焕发出求生的勇气，并找回共同对敌的政治智慧。1936年将验证这一点。

【名人聚焦】

来去两徘徊：胡汉民最后的抉择

◎陈红民

胡汉民 1931 年在约法问题上一言不和，竟被蒋介石软禁，贵为立法院长的他转眼即成阶下之囚。“汤山事件”使胡的政治生涯顿挫，也使他气急攻心，血压骤升，体质严重受损，性情也有所变化。他内心对蒋介石已有不共戴天之仇，获释后即南下，托庇于当时对南京保持着半独立状态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

胡汉民有恩于陈济棠。辛亥革命时，胡汉民是广东首任都督，而陈济棠两年后才走出军校大门，在粤军充任下级军官，直到 1929 年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胡汉民极力保荐陈济棠任广东编遣特派员，陈才逐渐控制广东军权，成了“南天王”。1931 年胡汉民被扣，反蒋派云集广东，使陈一时声名大噪。陈济棠对胡汉民南下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有胡这面大旗，蒋介石不敢轻易兴兵，忧的是若胡长驻广州，地位影响远在自己之上，恐于己不利。他确定的对胡策略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幸好胡汉民似也怕在广州易卷入纠纷，受制于人，选择香港为栖身之所，通过邹鲁、萧佛成等人遥控两广。大家都免去了尴尬，倒也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

但胡、陈两人的政治抱负有巨大的差别：胡汉民志在全国，他以“抗日、倒蒋（介石）、剿共”为号召，积极行动，联络各方，试图在全国组织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对蒋介石运动。陈济棠则满足于“南天王”的地位，深信以西南联手进行武力反蒋，胜算甚微，无异以卵击石，一旦失败，眼前的一切顿时烟飞云消，而果能侥幸得手，他自忖也得益有限。故而对胡汉民等的主张口头上

敷衍,但一旦进入实质阶段,他就或暗中设障,或公开阻挠。陈济棠牵制胡汉民最有效的办法是经济上卡脖子,动辄以减少活动经费相要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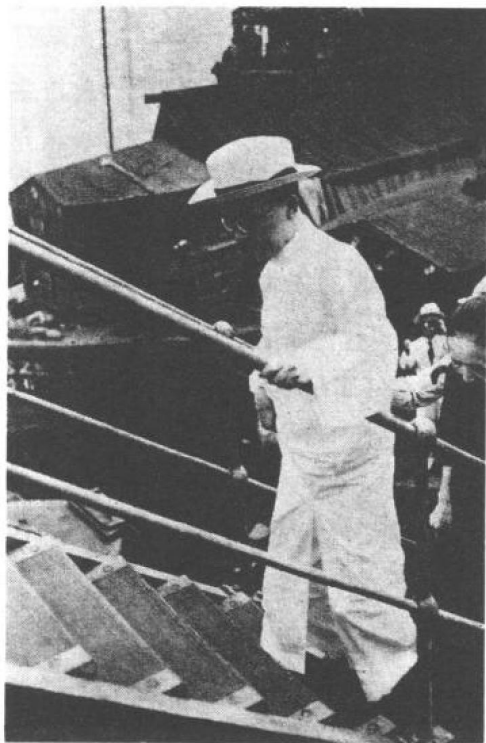
陈济棠的刁难,对曾经心志颇高、个性耿直的胡汉民是个不小的嘲笑。胡汉民及亲信气愤异常,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胡只能暂时隐而不发,还得劝慰手下人忍气吞声,维持局面。此时,胡汉民更注重的是基本的生存保障。1933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国内舆论哗然,胡汉民、邹鲁等人觉得是兴兵讨伐南京的绝佳机会,乃由邹鲁促成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军政当局在穗开会,秘商讨蒋大计。广西李宗仁、福建蔡廷锴都很积极,惟陈济棠推三挡四,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邹鲁气不过,跑到香港向胡汉民抱怨一通:“广东军事当局畏首畏尾,我们还唱什么抗日口号……我决意出国远游,不再过问国事,让他们去畅所欲为罢。”胡反而劝邹以“大局”为重,恳请他重回广州:“无论如何,你要回去,代我主持这个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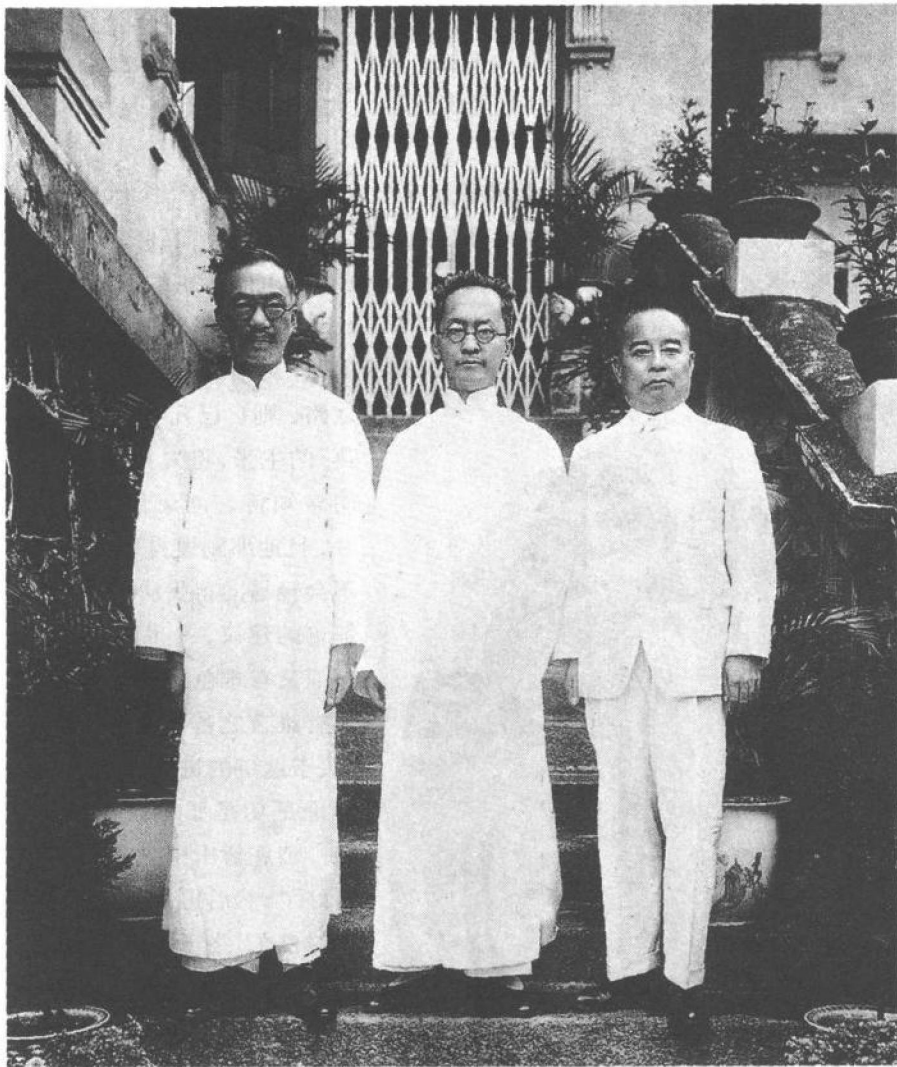
面。”当然,陈济棠也不敢把事情做绝,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威慑还在,逼走胡汉民对他更是有害无益。

近世中国是强权政治的社会,用胡汉民的话说,就是“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纵使有天大的影响,政治活动家要有所成就,推行其政治主张,最终都必须有相应的武力为后盾。胡汉民当年名气比陈济棠不知大多少,可政治是现实的,面对“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局面,他也只能困厄香江,仰天叹息。

胡汉民与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的结合,使蒋在武力统一时投鼠忌器,不能贸然下手,成了一大

孤傲的胡汉民登船去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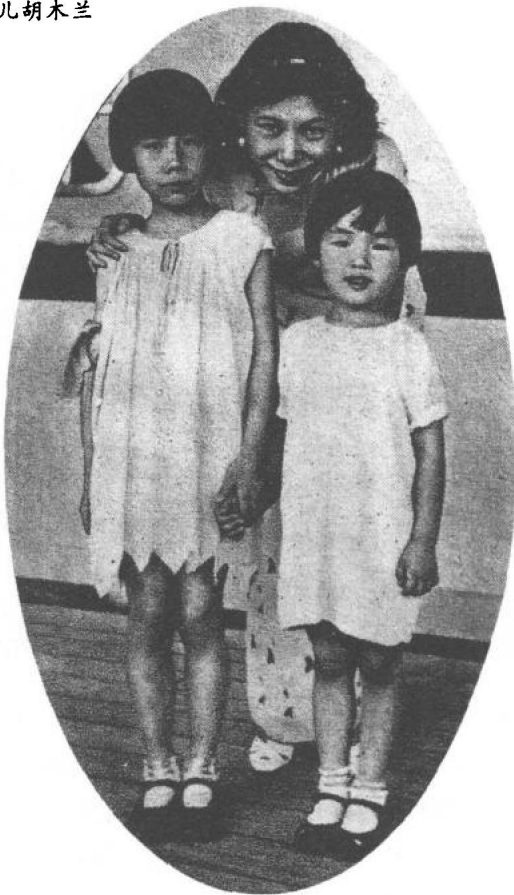
胡汉民(中)常驻香港。

心病。他决心拆散这对联盟，1934年底委托孙科、王宠惠到香港斡旋，与胡汉民商谈“合作事宜”。随后，胡的亲信李晓生又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蒋给胡亲笔信，以“故人情殷”相感召：“党国危机，四顾茫茫，甚盼后方同志无间彼此，日臻团结，以挽得天垂危之局。弟所望者，惟此而已。晓生同志转述厚意，故人情殷，敢不心领，亦望先生为国珍重是盼。”胡的复信态度稍硬，对蒋一

通责难：“国家所托于兄者，不为不重；国民所属望于兄者，不为不厚。今国家残破，民无死所……”要求蒋改弦易辙，速行改革，“共趋于救亡图存之正轨”。双方的接洽持续了一段时间，虽因差距过大未获成功，但还是缓和了对立的气氛。

1935年上半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日本在华北的步步进逼，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修改对日政策，着手抗日准备，而邹鲁等人在陈济棠处多次碰壁后，要走出不死不活的困局，转而寻求同南京的和解。邹鲁在取得进展后，赴香港与胡汉民探讨与蒋介石化敌为友的可能性。胡的心理十分矛盾：与蒋改善关系，不失为走出困境的出路，更何况若蒋真走上抗日

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



之路，则自己几年来“抗日倒蒋”的主张，将失去号召力；可胡素知蒋言而无信，吃过大亏，且他那刚愎自用的个性也不会轻易向蒋妥协。所以他听邹鲁的建议，一面点头称是，一面又有难色。邹鲁自然知道他有难言之苦，便进一步说：“关于这事的进行，由我负责，不论是功是罪，我愿独自担当。请您暂出国一行，等我进行好了，然后再请您回国。”胡思忖良久，终于答应先出国。

在那个年代，出国常有着深奥的玄机：政客一时失势，出国考察；军阀兵败下野，出国养病；甚至达官贵人家庭失和，也可出国休假。总之，出国是暂避一时，以图东山再起的捷径。胡汉民晚年体弱多病，出国治病是顺理成章的理由，

而且出国的妙处在于：邹鲁等人与南京的接洽一旦不成，无损于他的颜面与形象，因为他人在国外，“一无所知”；接洽成功，他可在各方“敦促”下去南京，比从香港直接北上要好得多，有了个台阶。

1935年6月9日，胡汉民携女儿木兰等一行共九人乘意大利“康特华第”号离开香港赴欧洲。这时，邹鲁与南京的联系结果不得而知，出国后的结局如何，是胡汉民自己都不知底的谜。为留后路，胡在行前发表谈话“辟谣”，称自己血压甚高且体质虚弱，出行纯为易地养病，“外间传闻种种，殊非事实。至有谓此行系受某方面之接济者，尤不值一笑。至于余之主张政策，亦不以时地之转移而有所变易也。”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为送别的人留念：

芦溪有句说奇男，不怅临分此老谿；
国蹙可堪为晋宋，诗愚未便到柴参。
从我游者道之合，尚有人焉计以南；
又试携儿行万里，十年旧事抵深谈。

1925年，胡汉民在广州政争失败，几乎被强迫上船到苏联去“考察”，只有木兰随行，政治前景十分黯然。这次远行，胡的前途也如滔滔大海中的行船，漂泊不定。

胡汉民先到威尼斯，经德国、瑞士，最后住在法国南部的乡村。他人在国外“养病”，关心的却是万里之外的国内的风声雨声。他以大量的信件、电报与邹鲁等人保持着“热线”联络，静观形势，以便确定新的行动策略。而南京的驻外领事馆接到指令，对胡关照备至，热情款待之余也示以最机密的国内来电，完全将其视为“自己人”。

邹鲁等人的联络工作成绩斐然。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邹鲁等人从广东北上参加。12月初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尚在国外的胡汉民为中央常委、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任副主席。国民党中央立即将这一结果电告远在法国的胡汉民，并促其尽快归国，“共赴国难”。蒋介石又让财政部长孔祥熙“补寄”旅费四万元，由驻法国大使馆转交。所有这一切，都是双方事先谈妥的，只不过将“剧本”搬上台面罢了。